

光明论坛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评论版投稿邮箱  
gmpinglun@163.com

高擎多边主义火炬砥砺前行

段虹

1月25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中再次阐明中国坚定奉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边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面对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社会不同场合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坚定不移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不移地维护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认可和鼓舞,其重要性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实践所证明。”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世界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依旧盛行,不断影响着国际社会稳定与发展;区域经济差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异长期存在,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等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主战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家园……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发酵,构成了人类前进道路上共同的困难与挑战。

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一直以来,中国不仅是多边主义的倡议者,更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和践行者。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援他国之所急,助他国之所需,为全球抗疫注入强大信心。当疫情在世界各地出现反弹时,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增加疫苗供应,毫无保留地与世界各国分享疫情防控和救治经验,用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多边主义国际新格局。此外,中国在维护网络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诸多领域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大国担当。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共同参与;不是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而是相互成就的共赢互利;不是要建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百花园。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选择。历史已经并将持续证明,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团结合作才是根本之道。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远未结束,世界经济尚未从过去一年的深度衰退中完全走出,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各国人民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方可乘风破浪、开创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高擎多边主义的火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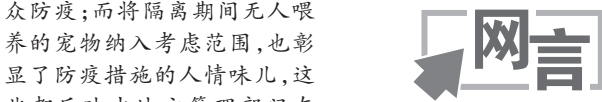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点赞! 抗疫政策的人性化“温度”在提升

1月23日,上海市卫健委公布确诊病例情况时只列举了若干涉病例的公共场所,没有谈到病例的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1月24日,北京市公布的流调报告也隐去了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北京市大兴区日前表示,集中隔离有宠物者可留一人居家隔离,还专设了可携带宠物的集中隔离点……诸如此类尊重公众需求的政策,获得了大家的好评。

事实上,以上政策的出台都是基于前期防疫经验作出的人性化调整。如今京沪两地的人性化调整,不仅体现了防疫政策的科学性,也彰显了防疫措施的人性化温度。

(原载于半月谈新媒体作者:郭艳慧 摘编:郝悦)



高校如何用好下放的职称评审权

艾萍娇

日前,教育部网站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落实高校职称评审自主权,围绕健全制度体系、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形成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评价科学、规范有序、竞争择优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

其实,早在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印发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就明确提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这次发布的“意见”是对上述办法的具体落实。将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给高校,是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举措,而高校要用好这一评审权,

需要推进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切实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方面的作用。如果这次职称评审权能彻底下放,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将全面实现高校自主评审,解决职称评审的双轨制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部分公办重点高校就开始获得教师职称评审权。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高校自主评审和行政(部门)评审同时进行。没获得职称评审权的高校,教师的职称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2018年,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发布后,我国把副教授职称评审权全部下放给高校,如此一来,加上之前已有部分高校获得职称评审权,就只有部分高校的教授职称评审还实行行政评审了。

所有高校都进行职称自主评

审,有利于高校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制订本校的评价标准。同时,这也能消除行政评审带来的职称“身份化”问题。一名教师在一校被评为教授,到另一校也是教授,这是因为,如果高校存在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的问题,由行政部门主导职称评审,制订评审标准,这样的评审就仍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我国之前已经获得职称评审权的高校,在评审职称时,重论文、重专利、重项目、重经费,导致高校人才评价存在“唯论文”“唯专

利”“唯项目”“唯经费”等问题,就是因为职称评审由行政部门主导,把行政部门追求的办学政绩,分解为职称评审以及教师考核的指标。而且,行政评价更在乎结果评价与数量评价,如对论文的评价,重视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期刊档次,并不重视论文本身的创新价值。这也是催生论文代写、论文买卖交易的原因之一。

多年来,针对高校职称评审存在的SCI(核心期刊)崇拜等问题,我国有关部门一直要求高校调整评价标准。这次发布的“意见”,也提出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等倾向,然而在具体落实时,教师们普遍担心,离开了论文、专利、项目、经费这些指标,职称评审会不会更讲人情关系,变为关系评价?对此,舆论呼吁在把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后,要进一步加

鹤壁高中违纪通报不该出现在互联网时代

李勤余

鹤壁高中一定想不到,一份看似平平无奇的通报竟会在朋友圈刷屏,并且引发巨大争议。题为《1月18日—1月24日违纪情况通报》的文章,不仅是网友吐槽的对象,而且成为不少专业人士批评的靶子。

该通报中涉及的违纪行为确实有些匪夷所思:除了“上课睡觉”“考试睡觉”“旷课”等常见行为,还有“抹护手霜”“梳头”“坐姿不端”“第三节自习课向别人传爆米花”“写网络小说”“哈欠不断”等相对奇葩的内容。

这篇文章刷屏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违纪的具体内容,而是它本

不该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不少网友表示,该情况通报让他们回忆起了自己的青少年岁月。这恰恰很说明问题:因为梳头、坐姿不端、哈欠不断等学习惯上的毛病在课堂、课堂上受批评的经历,我们这些成年人人都很熟悉,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中学的教育模式依然一成不变?

当然,违纪内容也有了一定的新发展。比如,有同学开始写网络小说了。只不过,时代在变,我们对新生事物的容忍度却似乎有提高。一言以蔽之,通报里反映出来的教育方法还是以“管”为主,并没有掌握收放自如,让学生自由发

展的诀窍。时间已经走到了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现象难免让网友感到失望。同样落后于时代的,还有这篇违纪通报的撰写方式。正如许多教育界人士所指出的,通报有侵犯学生隐私权之嫌。一些用词,比如“眉毛眼去”之类,也不太妥当。虽然不知道这份通报的作者究竟是谁,但是在发稿时的草率和不严谨显而易见。

该通报在朋友圈热传后,阅读量直线上升,之后发布者删除。运营者可能认为,该文章的读者仅限于学校内部人员,但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显然,微信号运营者对网络的传播速度和影响知之甚少。把上

述情况综合起来看,一份通报反映出的根本性问题是落后于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模式和教育方法。

我们在朋友圈热传这份违纪通报,是因为它勾起了难忘的回忆,更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份论调:2021年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前所未有,照理说,中国教育理念也该与时俱进才是。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将一份学校内部的违纪通报无限地在网上上线。一来,老师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学习,纵然老师值得尊敬,但初心毋庸置疑;二来,虽然是违纪,但该通报并没有写明具体的惩罚方式,从涉及的学生数量之多来看,通报很可能

属于一种提醒。所以,我们不妨冷静下来,先听听校方的说法。最新消息是,鹤壁高中表示该通报为强调课堂效率,不记入学生档案,已经责成年级主任深刻检讨,并要求年级主任对所涉及学生及家长进行公开致歉。

教育,都是为了孩子好。其方式方法有不足之处,那就好好改进;有不到位的地方,那就加强学习。舆论关注鹤壁高中的通报,不是为了用口水淹没这所学校,正相反,我们都希望该校的学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不再被不必要的“违纪情况”影响。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盲盒热”,情感满足与消费非理性的矛盾

盘和林

近日,中消协针对盲盒市场发布了消费提示,对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商家过度营销、商家涉嫌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难以保障和消费纠纷难以解决四类主要问题进行了提示,同时提示相关经营者,要从产品本身下功夫,不要一味蹭盲盒的营销热度,赢得了眼前的利益却丢掉了长远的口碑。

如果有留意,我们能发现在很多的商场、交通枢纽站等场所,传统的自动售货机里开始不再摆放普通的商品,而是摆着各式各样的盒子。不仅如此,盒子内的商品从最开始的泡泡玛特玩偶盲盒,到如今种类越来越多,包括手机、玩具、美妆等等。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盲盒是一种类似赌博行为,完全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赌徒心理,对盲盒经济并不认同。但需看到,当前的盲盒经济实际要有所区分,一类是收藏玩赏类的盲盒,一类是商品盲盒,对于

前者而言,要认识到其中存在的情感理性和消费非理性,而对于后者,要认识到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实际上,中消协指出的四类主要问题只有第一个问题涉及了消费心理,其目的并不全在于否定,而是呼吁一种理性的消费,其余三个问题则均涉及产品本身的问题。因此也可以看出,中消协更关注的是盲盒热后引发的市场乱象,而非非盲盒本身。2019年8月,有机构发布的《95后玩家剁手力榜单》显示,每年有20万消费者人均一年在盲盒上花费超过2万元,甚至有消费者一年要耗资百万元来购买盲盒。从数据来看,盲盒的玩家群体并不小,因此,从整体上来讲,很多人并不理解消费盲盒的心理。

购买盲盒有着情感上的理性和消费上的非理性,对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来说,为情感买单成为其主要的消

费心理。当前,对消费者而言,一件商品带来的使用价值和情感价值逐渐分离,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决定了其更侧重于一件商品的情感价值,盲盒内部的萌娃给予的“归属感”、盲盒收集带来的“成就感”以及盲盒社交带来的“归属感”都是消费者消费盲盒的主要动机。

不过,情感理性同时伴随着消费的非理性,不少消费者存在着“赌徒谬误”的观念,所谓“赌徒谬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随机序列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会随之前发生的事件有关,即其发生的概率会随之前没有发生该事件的次数而上升。如购买盲盒,之前没有买到,下一次买到的概率就会变大。理性来讲,我们当然知道每一次的购买是相互独立的,但对于购买时的消费者而言,赌徒心理会受到“赌徒谬误”的强化,从而进行冲动消费。

商家正是利用了这样一种情感

和消费心理上的矛盾,收割消费者的钱包。可能不少人会说盲盒经济也无非可议,其实不然。盲盒经济的问题出在了玩法上,因为消费者以及执法部门并不掌握某些玩偶的出品概率,这就导致了信息不对称,企业完全掌握出品概率会使企业拥有类似垄断市场上的定价权,如此一来,企业能够根据消费者的特点,榨干消费者购买盲盒所有的消费剩余。

商品盲盒与玩偶类有所不同,其不具有很强的情感价值,但商品盲盒往往用低价来进行营销,更加激发消费者的赌徒心理,并且商品盲盒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其缺乏企业的长期利润导向,从而一般都持有赚快钱的思维。在赚快钱的营销导向下,很容易会伴生产品质量问题,特别是随着盲盒经济从线下转到线上,由于消费者维权的困难程度变大,更鼓励了部分商家销

售假冒伪劣产品。

因此,中消协的提示非常及时,规范盲盒经济应该在消费者维权方面下功夫,特别是针对商品盲盒,重视使用价值的商品购买不要被低价营销的盲盒所迷惑。但对于具有收藏性、稀缺性的商品盲盒,规劝的作用可能有限,应多注意规范玩法,特别是对于概率要作出一定的规范,不能让出品概率由企业随意调整。同时对产品生产销售的违法违规行为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拓宽消费者维权渠道,增大违法成本。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现实樊胜美”背后的家庭观念流变

施芸卿

新闻随笔

近日,一位被钱塘江涨潮意外卷走失去性命的杭漂女孩,因被冠以“现实樊胜美”而上了热搜。在一档电视调解节目中,其父母要求其生前的公司追加补偿,以便拿补偿款为儿子支付买房首付。这个逻辑引发了全网愤怒,而视频所呈现出的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之痛”,更是戳中了众多女性的泪点。

“女性独立”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也在影视作品中频频出现,但讨论大多着眼于已婚女性,着眼于夫妻

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当经济独立时,她们是为自己谋划,还是以整个家为单位谋划?尤其是当原生家庭的“责任感”以道德压力出现的时候,她们该怎么办?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更需反思,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权责边界在哪里?父母与孩子之间,抚育和回馈的平衡机制在哪儿?在二胎全面放开之后,一家多个子女之间,相互扶持的底线在哪儿?诚然,这不是个新鲜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正在增强个人自主意识与转变较僵的家庭观念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

不同于其他领域,在家庭中,实际利益与道德情感融合极深,使得个人边界难以画出。常言道“血浓于水”,家,是从小就浸润其中的环境,

是以生命长度来预期的团队合作,是“一个人过得好不算好,大家都过得好才算好”的共同体。这些都使得家庭的“责任感”以道德压力出现的时候,她们该怎么办?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更需反思,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权责边界在哪里?父母与孩子之间,抚育和回馈的平衡机制在哪儿?在二胎全面放开之后,一家多个子女之间,相互扶持的底线在哪儿?诚然,这不是个新鲜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正在增强个人自主意识与转变较僵的家庭观念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

另一方面,家庭又同时受到社会变迁带来的“分”与“合”的双重冲击。随着新一代独立意识的增强、就业能力的提升、消费及生活方式

的变化,孩子从原生家庭中分离的愿望增强,希望能自主地掌控生活。但同时,物质进步同样带来了欲求的增加,房子、车子、子女教育等各方面压力,常常超出个人的经济能力,这又需要个人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源集中来解决问题。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在资源比较充裕的家庭还容易解决,比如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会逐渐成为一种以个人为中心、代际合作的模式。但如果家庭经济资源贫乏,如农村或是城市底层,尤其在多子女的情形下,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就很容易出现矛盾和倾斜,而这也让成员的自主选择更为困难。

最后,在扼腕痛惜之余,我们应看到在城市打拼的外来年轻女性的处境,她们勇敢、优秀、独立,但在面

临生活困境时却处于最无助的状态,更加重了其无以选择的艰难。她们往往在工作上承受着高强度的竞争压力;很可能租着房,早出晚归,在社区中不被看见,可得的邻里支持极少;而过大的环境和文化差异,又使得远在乡村或县城的父母,对于她们在大城市的生活难以想象,亲人的理解和支撑显得遥不可及。在电视剧中,无论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还是《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最后支撑她们走过艰难时光的都是姐妹情谊,但这在现实中可遇而难求,且没有制度支持。因此,比起她们自己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社会能为她们做什么?如何能使这部分业已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入过高的女性,能在我们的支持系统中被看见,在她们需要时可以得到帮助,让她们想要自主选择时可以从内外压力中松绑,与自身和解,这是我们面向“美好生活”时依然待解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